

# “疯女人”的真实面貌

## ——《藻海无边》中安托瓦内特的“杂糅”身份解读

林斌楠<sup>1</sup>, 王艳萍<sup>2</sup>

(1. 郑州西亚斯学院 外语学院, 河南 郑州 451100; 2. 集美大学 外国语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简·里斯使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的疯女人伯莎·安托瓦内特走出阁楼, 成为《藻海无边》的主人公。安托瓦内特生活在白人文化与黑人文化之间, 对白人既崇拜又痛恨, 对黑人既排斥又依赖, 是里斯的“复影”。借用霍米·巴巴的“杂糅”理论解读安托瓦内特的复杂身份, 展现克里奥尔女性的真实面貌, 探讨里斯对自己身份的深入思考以及对帝国殖民主义的解构。解读殖民主义时期的“杂糅”身份, 不仅仅有利于我们认识历史问题, 而且对当下人们普遍存在的文化身份认同焦虑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简·里斯; 《藻海无边》; 安托瓦内特; “杂糅”

**[中图分类号]** I 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3) 04-0085-08

## 一、引言

简·里斯 (Jean Rhys, 1890—1979) 是加勒比裔英国当代著名作家。1966年她凭借代表作《藻海无边》(Wide Sargasso Sea) 获得英国皇家文学会奖与W·H·史密斯奖, 同时她也凭此作成为英国皇家文学会会员。1979年美国著名学者桑德拉·吉尔伯特 (Sandra M. Gilbert) 和苏珊·古芭 (Susan Gubar) 发表评论集《阁楼上的疯女人: 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 对《简·爱》中被幽禁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安托瓦内特形象进行了解读。她们认为安托瓦内特是简·爱“一直试图压抑的狂暴而秘密的自我”<sup>[1]</sup>, 是她“心灵中的隐蔽的、愤怒的、疯狂的一面”<sup>[2]</sup>, 一时引起评论家们的热烈讨论。如今, 疯女人伯莎·安托瓦内特已是文坛上的热门话题。但实际上在吉尔伯特与古芭之前, 里斯早已注意到这个人物形象, 她的《藻海无边》是对这个疯女人的创造性重写: 在《简·爱》中伯莎·安托瓦内特是形象单一的边缘人物, 而在《藻海无边》里安托瓦内特是形象丰满的主人公。里斯以安托瓦内特为叙述视角, 叙述了安

托瓦内特从童年到最后纵火跳楼整个一生的经历。

《藻海无边》出版之后, 国外评论界掀起了研究热潮。后殖民理论家加娅特丽·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从后殖民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了小说中的主要人物, 如安托瓦内特与她的黑人伙伴蒂亚之间的认同关系、罗切斯特和他的财产继承问题以及黑人女仆克里斯托芬在小说中的作用<sup>[3]</sup>。朱迪思·L·雷斯金 (Judith L. Raiskin) 关注的是殖民历史对女性作家的影响, 对几位殖民地女性作家进行了比较研究<sup>[4]</sup>。伊莱恩·萨沃里 (Elaine Savory) 从空间变化角度切入, 探究了小说中地理位置与人物阶级地位之间的关系<sup>[5]</sup>。相比于国外研究, 国内研究相对较少。这些研究分别从被殖民者的抵抗声音、黑格尔主奴辩证哲学、第一人称叙述策略等角度进行分析。

本研究拟从“杂糅” (hybridity) 角度切入, 解读安托瓦内特身份的矛盾性与复杂性。“Hybridity”可译为“杂糅性”或“混杂性”, 在词源上表示两方面的内容: 一个是“生物或物种意义上的杂交, 特别是人种方面的混杂”<sup>[6]</sup><sup>118</sup>; 另一个在语言方面, 指“不同语系、语种或方

**[收稿日期]** 2023-02-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21BWW016);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研究项目 (19YJC752029)

**[作者简介]** 林斌楠 (1994—), 女, 河南洛阳人, 助教, 硕士, 主要从事英国文学研究。

言之间的混杂”<sup>[6]118</sup>。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从哲学与语言学层面进行讨论,将“对话理论”融入“杂糅”。他着重强调在政治话语中应提倡“众声喧哗式的、多声部相互交融的混声合唱”<sup>[6]119</sup>,以杂文化的话语对抗权威的专制话语。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在巴赫金的基础上进行独特的理论创见,将“杂糅”引入文学、文化研究领域,并使之流行起来。巴巴认为,“杂糅”意味着跨越不同文化的混合或融合。这种混合并不是简单地将两种或多种文化加在一起,而是各个文化元素互相交融、渗透、影响,从而创造出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的新的文化形态。在这个融合的过程中,新形成的文化形态之下的文化身份不再是“纯种”的,而是具有杂糅性的。巴巴用“杂糅”来分析后殖民语境中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他在《被视为奇迹的符号》中讲到:

混杂性是殖民权力、其不断变动的力量与稳定性之生产能力的符号;它是对借助否认(即那种确保了权威的“纯粹”、原初身份的歧视性认同)而实现的统治过程进行策略性倒转的名称。混杂性通过歧视性的身份效应的反复,而对殖民身份幻觉进行重估。它呈现了对歧视和统治的一切地点的必要变形和移置,扰乱了殖民权力的模仿或自恋需求,却借助颠覆策略重新表达了其认同<sup>[7]</sup>。

这段话意味着霍米·巴巴所谓的“杂糅性”是对殖民主义权力的一种反抗策略,即通过打破“纯粹”的身份认同,颠覆殖民主义者对于自身身份的幻觉,扰乱其统治的地位和需求,并且通过重新定义和重塑身份,使受到歧视的人能够反抗和抵制权力的压迫。

在巴巴的理论中,“杂糅”的具体化与扩展包括了一系列概念,如“模仿”(mimicry)、“第三空间”(Third Space)、“文化差异”(cultural difference)、“协商”(negotiation)、“转译”(translate)等。这些概念的出现,反映了对“杂糅”理论在实践中的不断发展和丰富。例

如,“模仿”指的是被殖民者在殖民话语下对殖民者的文化、习俗、价值等进行学习、重复、模拟,而在这个过程中,被殖民者并不是简单地接受和模仿殖民者的文化,而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第三空间”指的是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基于文化差异而呈现出的协商空间。这种空间处于文化之间,它不是一个实体的存在,也不属于原本的文化范畴,而是新的文化实践形态。《藻海无边》中,安托瓦内特是英属西印度群岛上的混血白种克里奥尔人<sup>①</sup>,在成长过程中既受白人文化影响,也受黑人文化影响。两种对立的文化在她身上杂交融合,形成她的“杂糅”文化身份。本研究主要借助霍米·巴巴的“杂糅”理论,分析安托瓦内特如何对白人既崇拜又痛恨,如何对黑人既排斥又依赖以及里斯为何重构安托瓦内特的“杂糅”文化身份。

## 二、安托瓦内特对白人既崇拜又痛恨

《藻海无边》中,因为安托瓦内特在殖民地西印度群岛长大,所以她从小就生活在白人殖民者文化的影响之下。英国殖民者在带来先进文明的同时,也对她所生活的家园进行了无情的剥削与压制,使得安托瓦内特对白人有着极其矛盾的态度。

从小说中可以看出,安托瓦内特对白人非常崇拜。在母亲嫁给继父(英国白人)后,她尽量“模仿”白人文化,“如今我们吃的是英国菜,有牛肉,羊肉,馅饼和布丁”<sup>[2]13-14</sup>。安托瓦内特此时“很高兴自己过得像个英国姑娘”<sup>[2]14</sup>,显然安托瓦内特对自己的英国化过程很是满意。她喜欢英国画作《磨坊主的女儿》,想象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如画里那般的英国女孩。在婚姻上,虽然她婚前有喜欢的人桑迪,但是她选择嫁给由继父安排的罗切斯特。她这样选择是因为桑迪是混血人种,而罗切斯特是英国白人。通过与罗切斯特结婚,安托瓦内特成功攀爬阶层,由地位低下的“白蟑螂”<sup>[2]5</sup>一跃变为受人

<sup>①</sup> 霍米·巴巴认为,克里奥尔人泛指“任何有色人种的‘他者’”,包括殖民地出生的混血儿、移民群体和飞散群体等。参见生安锋. 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17.

尊重的白人太太。她对罗切斯特所代表的白人权力阶层的追求,也就如小说中描写的飞蛾一样,朝着蜡烛一次又一次地飞去。后来罗切斯特出轨伤透了她的心,但她还是没有选择留在西印度群岛殖民地,而是跟他去了英国。当罗切斯特将她幽禁在英国阁楼上时,桑迪来解救她要带她离开,她却断然拒绝了桑迪。

安托瓦内特之所以对白人如此崇拜,是因为她内化了殖民意识。在帝国主义殖民过程中,殖民者与被殖民者都在潜意识中认为白人文化是先进的、文明的、典雅的、高贵的,而黑人文化是落后的、无知的、未开化的、低下的。作为被殖民者,安托瓦内特接受并认同这一观点,她从内心里鄙视西印度群岛黑人文化而向往英国白人文化。后殖民理论家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曾在《黑皮肤,白面具》中阐释黑人的身份分裂状态,当面对白人时,黑人的“身体结构显示出脆弱”,只能“眼看着自我的垮台”<sup>[8]</sup>。通过让自己与白人同化,安托瓦内特尝试摆脱自己身上所赋予的黑人贬义标签。

虽然安托瓦内特对白人非常崇拜,但是她又相当痛恨白人。她“模仿”白人讲英语,然而她的英语里面时常会夹杂西印度群岛的当地方言,比如向罗切斯特介绍黑人克里斯托芬时讲到,“这是克里斯托芬,老早以前是我的da,我的奶妈”<sup>[2]37</sup>,”da”显然不是英语。巴巴认为,被殖民者对宗主国文化“几乎相同但又不同”<sup>[9]86</sup>的模仿是对殖民者的一种嘲讽与威胁。安托瓦内特一方面用“模仿”认可白人文化,一方面又以“模仿”表达出其内心深处对白人强权文化的仇恨与颠覆欲。被囚禁到英国阁楼上后,安托瓦内特常在罗切斯特不在的时候和桑迪约会,“我们就在那间乏味的房里亲吻”<sup>[2]117</sup>。她以通奸行为来发泄对白人丈夫的怨恨。她的哥哥理查(继父梅森的儿子,也是英国白人)来阁楼上看着她时,她用刀子将理查捅伤。最后,仇恨驱使安托瓦内特纵火烧毁罗切斯特的桑菲尔德

庄园,看到大火逐渐蔓延开来时,她的内心充满了报复的快感。

安托瓦内特对白人满怀痛恨,这是因为以罗切斯特为代表的英国白人男性长期压制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罗切斯特在人格上漠视安托瓦内特,将她看作英国白人文化之外的边缘人。虽然她生着一副白面孔,但是她的身份依然是克里奥尔人。由于种族身份差异,罗切斯特认为她“是个陌生人”<sup>[2]36</sup>,并不真正接受与认同她。(2)通过占有安托瓦内特的财产,罗切斯特在经济上控制她。里斯将安托瓦内特的结婚背景设置在19世纪40年代的英属殖民地西印度群岛,当时还没有保护已婚女士合法财产的方案。根据英国法律与社会习俗制度,女性从属于男性,妻子的财产该归丈夫所有。在小说中,黑人女仆克里斯托芬劝安托瓦内特带着财产离开罗切斯特时,安托瓦内特回答到,“我自己根本没有钱了,我所有的一切都归了他”<sup>[2]66</sup>。在强大的帝国主义殖民与男权话语之下,势单力薄的安托瓦内特没有财产拥有与支配权,只能接受白人男性对她的经济掠夺。(3)罗切斯特在语言上对安托瓦内特进行暴力。当了解到安托瓦内特的母亲安妮特·伯莎最后疯掉时,罗切斯特非但没有给予同情、理解与心疼,反而故意伤害她。他不再喊安托瓦内特的名字,而是用她母亲的小名“伯莎”<sup>[2]83</sup>来喊她,“别那样笑,伯莎”<sup>[2]83</sup>。安托瓦内特为此提出反对,他回答,“因为这名字我特别喜欢。我把你当作伯莎”<sup>[2]83</sup>。显而易见,罗切斯特想把安托瓦内特逼成她母亲一样的疯子。(4)罗切斯特在精神上彻底摧毁她。在西印度群岛他故意出轨黑人女仆阿梅莉以刺激安托瓦内特;到英国后将安托瓦内特囚禁在阁楼上。

在与罗切斯特的对峙中,安托瓦内特完全处于“他者”的劣势地位,是英国白人男性的“属下”(subaltern)<sup>①</sup>。作为白种克里奥尔女性,安托瓦内特承受殖民主义与男性中心主义的双重压迫,她没有能力也没有途径反抗,是罗切斯特

① “属下”一词最先由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提出,用来指处于被统治与支配地位的意大利南部底层人民。斯皮瓦克对此概念进行了延申,将其用来指处于被压迫阶层而又无斗争途径的人或群体。“subaltern”也被译为“贱民”(侧重于指贫穷的、没有文化的人群)、“属民”或“草民”(强调从属之意)。鉴于学界多采用“属下”(含有上下级以及从属之意)这个译法,本研究也暂取这个译文。参见生安锋,李秀立.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民族主义与想象:佳亚特里·斯皮瓦克访谈录(下)[J].文艺研究,2007(11):57-65.

的“属下”。斯皮瓦克在《属下能说话吗?》中解释道,“属下是不能说话的”<sup>[10]</sup>。按照斯皮瓦克的想法,安托瓦内特没有话语权,即使发言也不能被罗切斯特代表的特权阶级所聆听与认可。因此,面对罗切斯特的压迫,安托瓦内特不得不屈服与顺从。

“属下”地位使安托瓦内特顿时陷入身份的不确定性中。她早已在黑人面前将自己与黑人区分开,认同的是自己的白人身份,而到了白人这里,白人的排斥与压迫将安托瓦内特“他者”化。她渴望融入白人群体,但白人并不接受她,只把她当作黑人。除此之外,在白人面前,安托瓦内特不自觉地认同自己的黑人“他者”身份,正如爱德华·W. 萨义德(Edward W. Said)所认为的,“我们不但是在西方的知识范围内被那些体制建构成为它们的差异和他者。它们还有使我们把自己看成或经验成‘他者’的力量”<sup>[11]</sup><sup>185</sup>。在“他者”化的力量下,安托瓦内特又将自己认可为白人群体里的黑人。她从对白人身份的认同变为对黑人身份的认同,反映出文化身份是不断变化的,恰如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观点,“文化身份不是永远固定不变的,它受制于历史、文化以及权力的持续‘游戏’”<sup>[12]</sup>。这种既认为自己是白人又认为自己是黑人的状态,构成了她具有矛盾性的文化身份。

### 三、安托瓦内特对黑人既排斥又依赖

由于在殖民地长大,安托瓦内特受白人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受黑人文化影响。对黑人而言,她是奴隶主压迫者,黑人们憎恨她。然而,殖民地的土地养育了她,在这里黑人们也让她感受到家一样的温暖。因此,与对待白人的态度相似,她对黑人的态度也同样具有矛盾性。

小说中,安托瓦内特对黑人颇为排斥。她和黑人小女孩蒂亚成为伙伴,一起玩耍,同吃同住。但是,在和蒂亚打赌赌输时,她将蒂亚称为“骗人的黑鬼”<sup>[21]</sup><sup>6</sup>,话里直接表现出对黑人的蔑视。她认为黑人不诚实、总想欺骗人。她将黑人女仆克里斯托芬视为她父亲送给她母亲的结婚礼

物,而不是和她平等的独立个体。当黑人克里斯托芬讲到没有去过英国,所以不知道有英国这个国家时,安托瓦内特流露出对克里斯托芬的鄙视与嫌恶,觉得她是一个“没知识的死脑筋黑人老婆子”<sup>[21]</sup><sup>67</sup>,显然安托瓦内特认为黑人是无知的。安托瓦内特曾坦率地说:“我从没正眼看过哪个陌生黑人”<sup>[21]</sup><sup>5</sup>。显而易见,在她眼里黑人们的地位是低下的。

她对黑人的这种排斥心理主要有2个原因:(1)黑人群体对安托瓦内特所代表的奴隶主阶层有着深重的仇恨。在小说的开篇,故事背景设定在黑人奴隶解放法案颁布之后的一年里,种族关系非常紧张。相对于黑人奴隶,安托瓦内特是奴隶主,享有种族与阶级特权。由于黑人们长期被英国白人殖民者暴力压制,所以内心充斥大量的愤怒情绪。他们在背后嘲讽、谩骂安托瓦内特和她母亲为“白蟑螂”<sup>[21]</sup><sup>5</sup>,并在暗地里将她母亲的白马毒死。后来黑人们的愤怒上升为仇恨,一群黑人聚集起来放火把她们生活的库利布里庄园烧为灰烬。安托瓦内特因为黑人仇恨她而厌恶黑人。(2)安托瓦内特已经将殖民意识内化,于是“模仿”白人殖民者对黑人的鄙视态度。欧洲白人认为自己的文化优越于其他任何非欧洲文化。当罗切斯特来到西印度群岛时,他以帝国主义欧洲白人标准衡量这个殖民地上的一切,认为黑人文化都是奇怪的。比如,对于黑人女仆克里斯托芬将裙子拖在地板上的做法,安托瓦内特解释在黑人文化里这是表示尊敬的意思,但罗切斯特坚持认为这是不干净的习惯。白人厌恶黑人文化的态度深深影响着安托瓦内特,她也不时地对此进行“模仿”。

实际上,她对黑人的排斥是对她自己身上的黑人“他者”元素的否弃。因为安托瓦内特是混血人,并不是纯粹的白人,她为自己身上的黑人“他者”部分感到厌恶与自卑。这种厌恶与自卑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由白人殖民文化建构而成的。在黑人身上,安托瓦内特看到了自己身上存在的黑人“他者”部分。通过排斥黑人,安托瓦内特试图获得自己纯粹的白人身份。

一方面安托瓦内特排斥黑人,但另一方面她对黑人也有着浓厚的依恋情感。她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黑人女仆们,对她们又是搂又是抱。在吃

着英国餐时,安托瓦内特又想念黑人女仆克里斯托芬做的饭菜滋味。她非常信任克里斯托芬,会向其寻求建议,请教如何解决自己与罗切斯特之间的问题。她看着克里斯托芬的住处时这样形容她自己的感受,“这里才是我的家呢,这里才是我的归属,这里才是我想要安身的地方”<sup>[2]65</sup>。于安托瓦内特而言,西印度群岛养育了她,承载着她的热爱,生活在这里的黑人能提供给她温暖与安慰。

安托瓦内特对黑人的依赖还体现在她的暴力反抗中。劳农坚持认为,“殖民化与去殖民化仅仅是一个武力较量的问题……殖民主义本质上是暴力,只有更大的暴力才能使它屈服”<sup>[13]</sup>,被殖民者只有通过暴力方式反抗殖民者才能获得自由。暴力反抗暗示安托瓦内特潜意识里对黑人文化的认同,反映出她对自己被殖民者身份的认同。在安托瓦内特的童年时期,黑人们因为仇恨她所代表的奴隶主阶层而放火烧毁了她居住的库利布里庄园。如今,面对罗切斯特的压制,安托瓦内特想到黑人们的暴力时不再感到厌恶,而是从黑人那里获得启示:她梦到自己纵火烧毁了这个囚禁她的牢狱桑菲尔德庄园,像黑人那样以暴力手段表达自己的愤怒。对安托瓦内特纵火时的场景,里斯是这样描述的,“我一边跑着,或许是一边飘着、飞着,一边就喊救命,克里斯托芬,救命啊”<sup>[2]119</sup>。在大火燃烧的危急时刻,安托瓦内特首先想到的是黑人女仆克里斯托芬,而不是白人。随后安托瓦内特在幻想中看到了儿时的黑人伙伴蒂亚在池塘边向她招手,示意她从燃烧的大火中跳下来,她就朝着蒂亚的方向一跃而下。

安托瓦内特对黑人的依赖隐含着她对自己文化身份的焦虑。巴巴借用拉康的镜像理论阐释殖民者文化身份对被殖民者的依赖。拉康认为,婴儿最初处在想象界,他们物我不分,以为自己与世界是混沌一体的。然而,在社会化的成长过程中,他们进入象征界,即发现自己与世界不是完美统一的,而是存在区别的,这个发现造成了完美感的缺失、“自我”的破裂。巴巴认为,殖民者来到被殖民者面前,以被殖民者为镜子时,“发现自己的完美的稳定的身份不见了……其文化身份仅仅来源于与其他文化的差异,自我身份

恰恰要依靠他者的存在”<sup>[11]76-77</sup>。与黑人相比,安托瓦内特是白人奴隶主后裔,是殖民者。当她从殖民者群体来到黑人奴隶面前,就像离开了母亲,身份上的不完整性使安托瓦内特产生困惑与焦虑。缺失感促使安托瓦内特用殖民话语来重申自己身份的完满,填补裂缝。为了保持自己奴隶主殖民者的身份,安托瓦内特需要将黑人视为“他者”,对他们进行排斥与压迫。然而,她殖民者身份的确立需要以黑人奴隶的存在为前提,因此她又依赖黑人。另外,在西印度群岛长大的安托瓦内特,本身对黑人文化也存在着自发的认同。她对黑人的矛盾态度反映了她既是被殖民者又是殖民者的矛盾身份。

#### 四、安托瓦内特——作者“复影”

安托瓦内特对白人 with 黑人都有着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这种心理实际上是作者里斯内心的真实投射。里斯出生于多米尼加,她的父亲是一名英国威尔士籍医生,母亲是有苏格兰血统的白种克里奥尔人。多米尼加位于加勒比地区的西印度群岛,当时是英属殖民地。里斯是家里5个孩子中唯一金发白肤的孩子,其原名为艾雅·格温多林·里斯·威廉斯(Ella Gwendoline Rees Williams),“格温多林”在威尔士语中表示“白肤”的意思,这让她很是反感<sup>[14]</sup>。里斯曾在童年时期热切地祈祷奇迹发生,“上帝啊,让我变成黑肤吧”<sup>[15]</sup>。她渴望自己成为黑人中的一员,喜欢富有生命力的黑人风俗文化,会说克里奥尔法语方言。不过,她同时也向往白人文化,从小学习英语,喜欢阅读英国文学作品。16岁时,里斯前往英国求学,后来和白人男性结婚。但是,里斯既无法融入黑人团体,也无法融进白人团体。黑人们因她的奴隶主白人后裔身份而排挤憎恶她,白人们因她的“杂糅”身份而排斥压迫她。

里斯对两种文化既渴望又排斥的矛盾态度折射出她自身的“杂糅”性身份特征。实际上,这种既爱又恨的矛盾性来源于一种“暗恐”心理。所谓“暗恐”,童明给出了详细的解释:

1919年,弗洛伊德在《暗恐》一文中阐述的“暗恐/非家幻觉”,是“压抑的复现”的另

一种表述,亦即有些突如其来的惊恐经验,无以名状,突兀陌生,然而无名并非无由,当下的惊恐可追溯到心理历程史的某个源头;因此,不熟悉的其实是熟悉的,非家幻觉总有家的影子在徘徊,在暗中作用<sup>[16]78</sup>。

“暗恐”概念最先来源于弗洛伊德,他认为它是一种惊恐情绪,这种惊恐情绪能够追溯到过去相识并熟悉已久的事情。具体来讲,当我们个人与文明产生冲突时,个人会为了适应文明的需要而进行自我压抑。但是,我们压抑的那部分并不会完全消失,它潜藏在我们的潜意识中,然后会不断地以不同的面貌或方式重新出现。在压抑重现的过程中,我们会产生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从而将我们的现在与过去联系起来。

里斯重写的人物安托瓦内特实际上就是她的“复影”<sup>[16]89</sup>。“我们对现在的某个人、某件事、某种情景做出暗恐反应时,那个陌生的人、事、情景就是复影”<sup>[16]89</sup>。也就是说,“复影”是使我们联想到过去某个经历,激发我们产生既陌生又熟悉感觉的人或事物。里斯在殖民地的成长经历,使她从小就看到并经历帝国主义殖民话语与男权话语的双重压迫,以至于给她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里斯将自己对这双重压迫的恐惧压抑在潜意识里。在里斯阅读《简·爱》的过程中,有着克里奥尔“杂糅”身份的伯莎·安托瓦内特触动了里斯内心深处的创伤记忆,所以伯莎·安托瓦内特是里斯的“复影”,或更准确的说,是里斯对殖民主义与男性中心主义双重压迫的恐惧的“复影”。

里斯对《简·爱》中伯莎的形象塑造极为不满,她认为夏洛蒂·勃朗特通过简·爱以及罗切斯特的视角呈现出的伯莎形象并不真实。例如,在简·爱眼里,伯莎“像个什么奇怪的野兽似地抓着、嗥叫着”<sup>[17]384</sup>,是一个怪物。在罗切斯特口中,伯莎出身于疯子世家,言谈粗俗陈腐,性格蛮横邪恶,淫荡卑鄙,是他“见过的最粗野、最下流、最腐化”<sup>[17]402</sup>的人。从勃朗特的描写里能够看出,伯莎的形象都是负面的。里斯对这种负面描述非常生气,“我为那些错误的克里奥尔场景感到恼火”<sup>[18]262</sup>。她指出勃朗特笔下的恶魔伯莎“只是一个版本——是英国版本”<sup>[18]297</sup>,换言之,是西方殖民话语里虚构的产

物。恰如萨义德在《东方学》里所分析的,“东方并非现实存在的东方,而是被东方化了的东方”<sup>[19]</sup>,土著黑人民族与文化不是纯粹客观的,而是欧洲白人在想象中创造出来的“他者”。

由于不信任勃朗特对伯莎·安托瓦内特可怕形象的塑造,里斯下决心要重写安托瓦内特。里斯曾坦言:“我认为必须对她进行正确描述。她必须至少是真实的”<sup>[18]156</sup>。实际上,里斯重写安托瓦内特,是在借用“复影”表达内心的愿望,她要反抗殖民与男性中心主义。

在重写过程中,里斯给予安托瓦内特话语权,从而使这个在英国文化里沉默已久的边缘“属下”发声。小说中,安托瓦内特的童年、婚前、婚后及最终被带到英国阁楼上的经历,里斯都是从安托瓦内特的视角进行叙述的。比如,关于捅伤理查这件事,在《简·爱》中,伯莎·安托瓦内特因为没有话语权,所以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导致伯莎展现出来的形象只能是罗切斯特与简·爱口中的兽性恶魔。而在《藻海无边》里,里斯特意剥夺掉罗切斯特的声音,让安托瓦内特成为叙事者来讲述这个事情的原因。安托瓦内特之所以拿刀捅理查,是因为理查讲到了“法律”<sup>[21]116</sup>一词。正是因为英国“法律”,安托瓦内特才失去自己的财产,逐渐沦落到悲惨的境地。

里斯在重构安托瓦内特形象的过程中尤其强调安托瓦内特的“杂糅”身份,将克里奥尔人身份的矛盾性与复杂性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杂糅”身份特性突出表现在白人文化与黑人文化之间的中间地带,即“衔接空间”(liminal space)。“衔接空间”是非裔美国艺术家利内·格林(Renée Green)提出的概念,他将整个博物馆建筑物中的“楼梯井”(stairwell)比作“衔接空间”,“是连接高处区域与低处区域的通道”<sup>[9]13-4</sup>。巴巴借用格林的观点来表述身份问题,他认为个人在“衔接空间”中由一端到另一端来回不断行走,“杂糅”身份在这个动态变化过程中形成。安托瓦内特在白人群体和黑人群体间不停往返,她的身上没有清楚的界限,既是白人也是黑人,既是殖民者又是被殖民者,既是“自我”又是“他者”。这种“杂糅”身份显示着对差异的包容。正如巴巴所言,“存在于两端

固定身份之间的间隙通道开启文化混杂的可能性,在没有假定的或强加的等级制度的情况下容纳差异的存在”<sup>[9]4</sup>。

虽然“杂糅”身份诠释着里斯对殖民话语的抵抗,但是里斯在抵抗的同时也维护了殖民话语。《简·爱》中,勃朗特为伯莎·安托瓦内特设定的结局是跳楼自尽,只有安托瓦内特彻底消失,简·爱才能顺利地和罗切斯特在一起,成为女性主义英雄。然而问题在于,勃朗特在成就了以简·爱为代表的白人女性的女性主义典范之时,却将以伯莎·安托瓦内特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女性排斥在外,维护了帝国主义殖民话语。在《藻海无边》中,黑人克里斯托芬最先出现于整个故事叙述的开头,之后一直活跃在文本中,直到与罗切斯特发生激烈争吵,“她头也不回,径自走了”<sup>[2]102</sup>,接下来的故事里再也没有提起过她,黑人克里斯托芬从此在文本中消失了。于是里斯在成就白种克里奥尔女性安托瓦内特的反抗精神时,将以克里斯托芬为代表的黑人女性排除在外,做了殖民话语的帮凶。如斯皮瓦克的分析,“帝国主义事业已经历史地折射出,本应是完全的他者,最终,却变成了巩固帝国主义自身的驯化了的他者”<sup>[20]</sup>。里斯作为殖民话语里的“他者”,将黑人克里斯托芬最终排除在故事叙述之外,所以里斯又成了被驯化的维护殖民主义的“他者”。换言之,里斯本是殖民话语的反抗者,却又成了殖民话语的维护者,她的身份再次具有“杂糅”性特征。里斯为此也很苦恼,“我做的一件蠢事就是读了太多遍《简·爱》,然后我发现它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写作”<sup>[18]161</sup>。实际上,里斯这种对殖民话语既抵抗又维护的矛盾性真实再现了克里奥尔人的现实矛盾状况,就如她多次强调的:“我要写真实的故事,按它本来的样子”<sup>[18]153</sup>。“杂糅”身份揭示出小说中反抗的不彻底,暴露了里斯不够鲜明的反抗态度,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殖民话语。

## 五、结 语

安托瓦内特对白人与黑人的矛盾态度,折射出她的“杂糅”身份。通过书写“复影”安托瓦内特,里斯展现了克里奥尔女性承受双重压迫

的现实状况,揭示出欧洲白人男性中心话语的暴力压制。文本分析帮助我们认识到,殖民文化本身就存在自我消解的因素,殖民者的权力不是绝对的稳定不变,而被殖民者也不是没有任何抵抗能动性。当今时代,全球化一方面促进了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文明冲突,如“南北半球发展不平衡以及帝国内部的阶级区隔、种族歧视、贫富分化等”<sup>[21]</sup>。文化身份问题在全球化语境下变得尤为突出,“人民和民族正试图回答人类可能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是谁?”<sup>[22]</sup>人们倾向于进行2种选择,一种是对民族身份纯粹性、本真性的追求,另一种是在同化作用下消失。然而,“杂糅”者(比如混血儿、移民群体、跨国流动者等)的身上既保有祖国的文化、历史印迹,又融合有新的文化形态,而且永远也不会再回到原初的纯粹性。对殖民主义时期的“杂糅”身份解读,不仅有利于我们认识历史问题,而且对当下人们普遍存在的文化身份认同焦虑具有启示意义。

### [参考文献]

- [1] 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 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M]. 杨莉馨,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460.
- [2] 简·里斯. 藻海无边[M]. 陈良廷,刘文澜,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 [3]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M] // DAVID H. RICHTER. The critical tradition: Classic tex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New York: Bedford/St. Martins, 2007: 1837 - 1849.
- [4] JUDITH L RAISKIN. Snow on the cane fields: Women's writing and Creole subjectivity [M].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 [5] ELAINE SAVORY. Jean Rhy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33 - 151.
- [6] 汪民安. 文化研究关键词[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 [7] 翟晶. 边缘世界:霍米巴巴后殖民理论研究[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57.
- [8] 弗朗兹·法农. 黑皮肤,白面具[M]. 万冰,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121.

- [9] 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M]. London: Routledge, 1994.
- [10]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M] // CARY NELSON, LAWRENCE GROSSBERG.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Urbana: Macmillan Education, 1988: 308.
- [11] 贺玉高. 霍米·巴巴的杂交性身份理论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 [12] STUART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M] // PATRICK WILLIAMS, LAURA CHRISMAN.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4: 225.
- [13] 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M]. CONSTANCE FARRINGTON, trans.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3: 61.
- [14] ELAINE SAVORY.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Jean Rhy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
- [15] JEAN RHYSS. Smile, please: An unfinished autobiography [M]. Suffolk: Penguin Books, 1982: 42.
- [16] 童明. 解构广角观: 当代西方文论精要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 [17] 夏洛蒂·勃朗特. 简·爱 [M]. 祝庆英,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 [18] FRANCIS WYNDHAM, DIANA MELLY. The letters of Jean Rhys [M].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Inc, 1984.
- [19] 爱德华·W. 萨义德. 东方学 [M]. 王宇根,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141.
- [20] 加亚特里·斯皮瓦克. 三位女性的文本以及对帝国主义的批判 [M] // 巴特·穆尔-吉尔伯特. 后殖民批评. 杨乃乔, 毛荣运, 刘须明,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236.
- [21] 王斐. 全球化与帝国空间建构: 解读《橘子回归线》中的空间非正义 [J]. 集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24 (3): 86 - 93.
- [22]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M]. 周琪, 刘绯, 张立平, 等,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9: 5.

## Madwoman's Real Image:

### An Interpretation of Antoinette's Hybridity in *Wide Sargasso Sea*

LIN Binnan<sup>1</sup>, WANG Yanping<sup>2</sup>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ngzhou Sias University, Zhengzhou 451100,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Jean Rhys lets the madwoman Bertha Antoinette in Charlotte Bronte's *Jane Eyre* walk out of the attic and become the heroine of *Wide Sargasso Sea*. Antoinette lives between the white and the black cultures, worshiping and hating the white, rejecting and relying on the black. She is the "double" of Rhys. With the theory of Homi K. Bhabha's hybridity, the paper interprets Antoinette's complex identity, which shows the real image of Creole women. And it explores Rhys' deep reflection on her own identity and Rhys' deconstruction of the imperial colonialism. Interpreting the hybridity identity of colonial period is not only helpful for our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problems, but also gives us inspirations about the prevalent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anxiety in current era.

**Key words:** Jean Rhys; *Wide Sargasso Sea*; Antoinette; hybridity

(责任编辑 张永汀)